

历史·名家·记忆

生活在巴黎的大学城(1979至1981年)(一)

陈德昌

一、从欧洲经典古建筑群 Deutsch de la Meurthe 说起

1979 年我去巴黎, 中国留学生被分派到巴黎不同的高等院校进修。按“外国学生接待中心”安排, 我们大多数居住在“大学城”(Cite Universitaire)。大学城占地面积很广, 每幢楼房都以不同国家不同命名, 其中, 比利时(1924 年)、加拿大(1925 年)、西班牙(1927 年)、日本(1929 年)、摩洛哥(1953 年)、意大利(1958 年)等, 建筑风格各有特色, 可惜我没有时间去观光。楼房并不专供本国留学生住宿, 外籍学生占 30%~50%。中国对外开放不久, 那年首次向法国派出留学生, 没有中国馆, 我们居住比较分散。

巴黎大学的鼻祖是“La Sorbonne”, 始建于 1150 年, 是欧洲第二所最古老的大学。我此次来法国学习在巴黎第五大学, 全称 Universite Rene Descartes。我居住的大学城创建于 1925 年, 由时任 La Sorbonne 的校长 Andre Honnorat 和 Emile Deutsch de la Meurthe 合作而告落成。他们的核心思想是发扬和平、团结、友好和合作的精神,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研究学者、大学生们提供聚会的场所。大学城的全名是巴黎国际大学城(Cite Internationale Universitaire de Paris, CIUP), 位于巴黎第 14 区。大学城的南边贴近“环城植树大道(Boulevard Peripherique)”, 北面是公园(Parc Mont-Souris)。

我选择大学城最老的建筑群 Deutsch de la Meurthe (1925 年), 大门是由一排粗大的圆形石柱, 拱顶着长条横梁, 上面清楚地刻着“国际大学城”字样, 石柱之间没有门, 进出无阻。走不了太远, 就是一大片精心修剪的、几何图案式的冬青树, 法国式的园艺。再往前就是建筑群的主楼, 大学城的接待大厅, 很宽敞, 有两层, 双侧楼梯迂回

而上, 像两只手臂拥抱着, 很有气派。主楼旁有钟楼, 尖耸的屋顶。主楼两侧另有两座楼房, 中间一大片草地, 绿得很干净。我住在最进深处的“Pavillon Pasteur”, 和邻近的“Pavillon Curie”联成一片。

据目测, 我居住的房间约 25 m², 一张单人床, 窗沿下一张书桌, 两把坐椅, 装设简单, 壁橱足以容纳我仅有的一件大衣、两套西服、平时穿着的衣裤和我从北京带来的笨重的衣箱。另一侧小壁橱, 中间有夹板, 一半堆放着书籍、笔记本, 另一半储存着杯子、瓶子、碗盘、锅匙和刀叉等少量餐具, 我在家里从来没有烧过菜。洗手池和一面镜子, 也是嵌在墙壁里。厕所就在走廊对面。公用厨房在楼上。

从 Pavillon Pasteur 正面的窗子望去, 像处身在 19 世纪的欧洲, 修道院般的安静。最初来到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中, 只有我一人选择了 Deutsch de la Meurthe, 很可能我受中学时代读过几本法国经典小说的影响, 潜意识在寻梦。大学城是繁华大都市中的一块人间净土。在大学城生活两年, 巴黎的历史和文化的魅力第一次默默地浸润着我的头脑, 永存而不忘。

中国留学生多数选择住伊朗楼。这是一座高层建筑, 看上去, 中央是根粗大的柱子, 各层宿舍分割成几段, 好像一只一只鸟笼挂在大树上, 设计独具一格。我并不欣赏伊朗楼的外观, 却喜欢大楼的内部居住条件。每间房间以及外围长廊都是落地大玻璃, 视野开阔。站在高层, 放眼望去, 离大学城稍远处是高速公路, 交通高峰时间, 从一个方向驶来的, 尽是车前耀眼的白灯。从相对的方向驶去的尽是车尾的小红灯, 像血管内的血细胞川流不息。初到巴黎, 这番景观给我视觉上的冲击, 确似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二、神奇的时空跨越

记得 1937 年日军侵入上海闸北区, 全家匆忙搬进法租界的石库门楼房里, 和他姓的亲戚挤在一起。最初以为是避难权宜之计, 没有意识到一场持久的残忍的战争已经开始。原来的住宅大院正好被

DOI: 10.3877/cma.j.issn.2096-1537.2019.01.018

作者单位: 100730 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

通信作者: 陈德昌, Email: chendechang1932@aliyun.com

日军炮弹击中，全毁了。相隔一条街的下海庙，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从此，我们一家定居在石库门楼房两间斗室里，冬天没有取暖设备，楼内没有抽水马桶，一下子住了 37 个年头。1964 年我奉调进北京协和医院，全家住东单新开路胡同宿舍，这原本是一家英国医院，后来被协和医院收购，改为医师宿舍。我们入住的那年，已是 72 家房客的群居楼。每家厨房设在自家房间的边侧。所谓厨灶不过是简单的铁架子，要定期到供应站更换充好气的煤气罐，用一块木板将其按上 4 只小轮子的小车，拖着运回家来。做饭时刻，锅铲叮当作响，炒菜声夹杂着主妇们的说笑，走廊一片热气腾腾。楼房年久失修，仍保留着西洋建筑的骨架子。底层走廊上有一段圆形拱顶，没有门。楼梯宽大。供暖系统彻底破败，冬天室内烧蜂窝煤取暖，时不时要铲除炉灰。过冬需要储存大量的大白菜，费时间码放整齐。终算楼内有了公共厕所。我从来不曾想过，有机会来到巴黎。

呈现在我眼前的巴黎大学城，始建于哪年，最初我不知道。有张照片，我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正面刻有“1842”大字，曾误信以为真。大学城一幢一幢楼房都是历史的标志、是时代的见证，分散地嵌在大片的绿色草地上。从 Deuth de la Meurthe，到现代化建筑的伊朗楼，虽然也有一段较长的距离。毫不夸张地说，我初到之时，经历着神奇的时空跨越。然而，我是从北京新开路胡同走出来的。

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前门大街上，有轨电车缓慢地行驶着。大栅栏人群嘈杂。北京多的是胡同和裸露的泥路，土厕所香飘万里。70 年代改变不大，首都机场很小，巴黎戴高乐机场乃庞然大物，北京的东单与巴黎大学城相距千里。时空跨度的感觉被极度放大。

30 年后的今天，从北京我居住的小区高楼顶层，看到四环路立交桥和高速公路，不知道从哪里涌出来的车流不息。即便凌晨三四点钟，路面上行车比白天稀疏，但终有一批人急急忙忙驾车而过。同样可见车前耀眼的白光和车尾的红灯，对面几幢办公大厦，不同层楼常见一长排办公室被不知疲劳的灯光照亮着。改革开放正在深刻地改变着这座古老的北京城。我想到了 1979 年的巴黎。

社会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也充满着不确定性。预言未来，不容易。一个国家必须开放，一个人必须走到世界上来。旅游者只能观赏外景，不可能认识世界。我来到巴黎，在大学城住上两年，结识了一些法国朋友，主要是年轻人。中学时代打下的语文基础，学过一点粗浅的法国历史，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在巴黎学习很多东西，不仅是医学。巴黎有着沉甸甸的历史底蕴。我不认为她是花都之城。一叶一菩提。一个巴黎，一个世界。

(收稿日期: 2017-11-19)

(本文编辑: 卫轲)

陈德昌. 生活在巴黎的大学城 (1979 至 1981 年) (一) [J/OL]. 中华重症医学电子杂志, 2019, 5(1): 85-86.